

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 编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



黄亚光 文稿和日记摘编

魏协武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
(1943—1947)



1947年2月4日，转战前夕，黄亚光行长（前左二）、张定繁副行长（前左三）与辛波（前左一）等优良工作者合影。

中國人民銀行西北區行分行長聯席會議合影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



黄亚光（前左五）与乔培新（前左二）、杨万胜（中左三）、吴春圃（中左六）、李东甫（后左一）等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分行长联席会议上合影。



▲黄亚光同志为陕甘宁边
区银行纪念馆题词



▲1990年4月9日，黄亚光（左五）和夫人
吴桂芳（左三）与来访的陕西、福建省行及延
安分行的同志合影。



◀黄亚光夫人、边区
银行老干部吴桂芳与来
访的崔海明（左一）、魏
协武（左二）亲切交谈。

▶黄亚光在陕西和延安同志的搀扶下
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寻找资料。



发扬延安
精神

黄亚光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六日

黄亚光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的题词

她安是当时党中央所
黄亚光同志深入细致
将工作记入日记留给后人
陕甘宁边区金融工作记载
最真实宝贵难得！
我们今后一定要发扬光大！！

乔培新 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

乔培新同志曾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调研处长，离休前任中
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

出版说明

黄亚光同志是党的金融事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对我国革命金融事业，尤其是货币设计，有过特殊的贡献。近年来，我们挖掘了黄亚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的部分文稿和日记，将它编辑成《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出版，作为向中国人民银行成立50周年的献礼！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毛主席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成长和边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及其对边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金融和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伟大胜利。黄亚光文稿和日记，翔实地记述了这一历史变革。黄亚光作为边区银行的领导，参与了边区政府、西北局和党中央的许多活动，所以也部分地记述了边区的发展和党的历史。

《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的出版，不只是为了学习和研究革命金融史提供可靠的资料，重要的是它将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革命先辈的艰苦创业精神，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整理摘编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由于半个世纪前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稿和日记的纸质低劣，字迹不清，和一些用语不同，经过再次复印，更加难以辨认，得用放大镜推敲判断。有些篇章本来较为重要，却因模糊不清，无

法选用；有些篇章虽较一般，但与某一事件有一定的联系，还是编入了；对个别有明显错漏的字句，作了必要的处理；不能辨明的字句，用相应的□代替；有些不便署名的人则以×××代之。由于水平有限，摘编不当和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赐教。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重视。戴相龙行长亲自批示总行办公厅“关照支持”，原副行长乔培新欣然为书稿题词；总行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长周世敏、中国金融出版社原总编许树信，不仅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还亲自参与编审和为书稿作序。总行办公厅、教育司、陕西财经学院的领导和甘勇处长、赵金铎教授，以及陕西省分行、延安市分行、福建省金融研究所的领导和有关同志，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1997年7月

序

黄亚光同志是1926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是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工作的金融战线上的老前辈，又是多年从事银行领导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我们两人都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所以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为黄行长。黄行长在参加革命时就是位知识分子，能书善画，才华横溢。他的毛笔书法很有功夫，蝇头小楷细密整齐。也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工作笔记非常工整细致，特别是他有一个可贵的习惯——坚持每天记日记。《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就是他从1940年到1946年所写日记的选辑。1997年乔培新副行长（他的老战友，在延安时曾任边区银行业务处长）看到这部书稿时就说：在延安时，领导同志坚持写日记的不多见，这部日记能够留存下来，实在是宝贵的财富。把它整理出版，是件大好事。

我们有幸读到这部日记，很受教育，很受鼓舞。黄行长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难能可贵。正是由于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坚持记日记，才使得我们有了第一手材料了解到在延安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某些侧面；了解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同志在当时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边区银行的同志们如何想方设法印制发行

边币；作市场调查，稳定金融；积极贷款，支持经济发展；搞生产自救，种粮、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还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体现出同志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凡此种种，在黄行长的日记里都有生动的反映，字里行间闪烁着“延安精神”的光辉。因此，这部日记实际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同志的革命实践的缩影，很值得一读。

读了《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使我们不禁回忆起解放后和黄行长相处的日子。当时他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单位的主要领导之一，而我们是一般干部。在日常接触中，看到他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身体不太好，但经常加班加点，翻阅文件或找人谈话。他在党内从不以领导自居，按规定参加组织生活，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都是他的下级科级干部，而他则经常主动向党小组汇报思想。他表面看来挺严肃，不苟言笑，但实际上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他高尚的思想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也有它的局限性。由于它是日记体裁，所以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背景等记述的比较少。又由于它是私人日记，所以边区银行的业务工作和活动记述的比较少。这虽然是个缺憾，但我们认为，读者只要把它与有关的史籍结合起来阅读，定会给那些千巴巴的史料增添不少鲜活的内容。

· 周世敏 许树信

1998年9月

目 录

序	周世敏 许树信 (1)
概述	魏协武 (1)

第一篇 文稿选辑

信用合作社与边区银行的关系	(20)
与中国记者的谈话	(22)
边币发行的目的和作用	(27)
边区金融小史提纲	(29)
抗战结束阶段关于边区银行金融工作的检讨	(50)
物价难于稳定，比价必须稳定	(66)
行长联席会议决议草案	(69)
一九四七年陕甘宁金融贸易工作报告	(79)

第二篇 日记摘编

一九四二年	(95)
一九四三年	(125)
一九四四年	(141)
一九四五年	(177)
一九四六年	(220)

第三篇 访谈与怀念

黄亚光行长率领陕甘宁边区银行转战陕北

..... 周世敏 许树信 (281)

坎坷一生清白在，为党为民意志坚

——黄亚光生平简介 魏协武 (288)

访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图案

设计者——黄亚光同志 张新明 (291)

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

设计 张建新 (294)

革命老人的拳拳之心

——访红军老战士黄亚光同志 庞 纪 (300)

老行长的心愿

——访黄亚光同志纪实 魏协武 (310)

概 述

魏 协 武

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37年10月成立，至1947年11月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历时十年。先后三任行长，黄亚光的任期即达六年。坚持记日记是黄亚光的一大特长，在筹建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的过程中，就曾闻悉黄亚光的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但经多方查找都未得到日记的一点线索，就连黄亚光本人及其家属也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

挖掘黄亚光日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奔波，终于在陕西省档案馆保管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案卷中发现了日记的复印件，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啊！1986年全国金融会议提出，金融职工都要记日记。记什么？怎样记？能否坚持？多数职工感到疑惑。原打算把黄亚光日记整理出来，介绍给广大金融职工，有利于记日记活动的开展。通过整理，发现黄亚光日记不仅解决了记日记的方法和内容问题，也不只单纯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而且是一个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黄亚光日记摘编是从黄亚光1942年6月调边区银行至1946年底，4年又7个月的时间里，近50万字的日记里遴选出来的。包括文稿在内，既体现了黄亚光的革命风范，又反映了边区广大金融工作者，在革命摇篮经受锻炼的情景；既体现了

党中央、毛主席和边区党政军领导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又反映了边区金融事业的巨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内容是十分广泛和丰富的。

一、黄亚光同志是一个饱经沧桑，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黄亚光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在肃反错误的屠刀下没有动摇，毅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稳定了，官做大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对革命充满了信心。“窗隙透鱼白，小儿呼天光”。1943年的开始，带来了生产与教育两个中心工作。在银行怎样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布置工作，随时涌现心头。”这是黄亚光1943年元旦日记的开头语。新的一年开始了，银行工作如何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黄亚光在1944年元旦的日记里写道：“今年是法西斯将要倒霉的一年，中国新民主主义将要更加发展的一年，困难的克服虽然还待我们去百倍的努力，但肯定的光明前途是展开了。”是的，边区在党中央毛主席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下，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战胜重重困难，实现了“耕三余一”。正如他在1944年1月24日的日记里写的那样，“今天是1943年旧年的最终一天，万家灯火照耀各个山头，延安宛如香港之夜，已一变几年来荒凉之气象。环顾革命与战争的环境，尚须我们百倍的努力，我们在陕北屈指已十年，比诸中央苏区还更巩固。再过二年将不是今年的面貌……。”

黄亚光同志长期做领导工作，他不是做官当老爷，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废寝忘食地工作。亲自起草文件撰写报告，亲自整理资料统计数字，亲自做调查研究。他不尚空谈，善于在实践中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出正确的判断。通过黄亚光日记，不难看出他的工作是很有节奏的，忙而不乱，卓

有成效。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礼拜和节假日，没有上下班和昼夜之分。往往通宵达旦地学习、写材料，研究工作。为了掌握边、法币斗争的主动权，有力地打击黑市活动，他经常活跃在延安一些大的商号客栈，了解市场行情，随时调整比价。1944年8月中旬，黄亚光积劳成疾，发高烧至41度，还在坚持工作，经中央组织部部长兼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陈云同志的督促，才被迫住院休养。9月中旬刚刚出院，就和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等一起赴子长、绥德、米脂、佳县等地调查，摸清了边、法币的流通范围和规律，提出了扩大边币流通的办法。1942年8月2日，黄亚光的夫人吴桂芳问黄八路军的几个师的番号 and 负责将领的姓名，黄答不上来。对一个金融工作者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问题，黄亚光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己作为八路军之一员，这是熟视无睹，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主观主义作风，是自己身上的一种毒素。当即去翻资料了解和掌握这一情况。

做工作就会有错误，检讨、自我批评对那一代人来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坏事。他们把检讨和总结工作等同对待，从上到下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而推动工作不断前进。1942年8月1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参议会常务会议报告中对政府工作提出五点建议：①记日程功，反对拖延；②学习业务，培养专才；③注重领导，月计有余；④善成法治，实行民主；⑤希望注意干部健康，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健康。黄亚光认为这不仅是针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缺点，正是针对自己的缺点下药的。他说来银行几乎两个月了，了解情况是粗枝大叶的，日计有余，月计不足，今后要抓住中心好好的去做一番。1943年12月17日，西北局召开会议讨论财经工作，财政厅、物资局的同志发言后，黄亚光自觉地检查金融工作，他说“今年下半年我们没有负到应有的责任，使边区金融大紊乱，黑市上涨到1600—1500，物价高涨14倍多（小米）。其他生产战线上的经

济工作都好，唯有财政金融工作不好。金融这样紊乱，表示了我们无能。”

那个年代同志间的革命情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建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尤其在离别时总要互赠几句肺腑之言。1945年10月，曹菊如要出发去东北了，这两位经过长征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老战友，难舍难分。临行前还相互检讨，曹菊如说自己主观，黄亚光检查有些寡断，决定问题不爽快。这种精神今天几乎是看不到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能成为制度，一是领导带头，要求严格。二是注意做善后工作，开展谈心活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十分受人崇敬，人们尊称“林老”，是“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多的代表之一，在党团会上主动做自我批评，黄亚光说这对他教育很大。1942年11月参议会大礼堂讨论党政军民关系，一些部门做检查，林老要求：①脱掉帽子，②割掉尾巴，③抓住中心，④出门见山。接受批评有时也是不好受的，但能正确对待。1944年3月9日，黄亚光被西北局领导批评为“张伯伦”，他入夜回银行很不舒服，在日记中说“不自觉未遵守停发决定，又一次教训了我，认识时要绝对弄清白，否则会出岔子。”黄亚光有受领导严肃批评后不好受的亲身体会，所以他也注意被批评者的情绪。1946年7月29日支部会讨论刘小明的鉴定，指出其有能力外，强调其缺点有五，批评后刘小明思想消沉，黄主动找他谈话沟通思想。他经常利用晚间开展谈心活动，谈工作，谈思想，虚心听取批评建议，主动改进工作，有效地密切了干群关系。

忠与孝，是每一个革命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衡量一个革命者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重要标尺。黄亚光远离家乡，多次接到家书，母亲脚烂不能行走，女儿生活困难……这些问题曾使他心酸难过。但是为了革命工作，他都以